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07963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875印张 157千字
1982年11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4,201—6,200

书号 11115·48 定价0.78元

目 录

近七十年来贵州的医药卫生事业·····	钱允中 (1)
贵阳同济堂中药店的创办和发展·····	曾仁昌 汪凡 (30)
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	华问渠 遗稿 (36)
回忆泰丰字号·····	胡蕴植 (51)
贵州企业公司概述·····	杨大士 桂锦洋 (72)
王文华、袁祖铭、周西成以及李榮的兴起和覆亡	
·····	胡寿山 遗稿 (82)
我参加东征和北伐·····	宋思一 (125)
贵州省训团忆实·····	周立华 吕新民 (134)
贵州县长考试记略·····	夏骏声 (147)
中国青年党在贵州的活动·····	邓宗骏 李福祥 (151)
我竞选国民党国大代表的经过和见闻·····	刘裕远 (162)
国民党在贵州的邮电新闻检查·····	张运昌 (173)
忆南洋蒙难·····	罗次启 (178)
于斌在贵阳的活动·····	周健钟 (184)
外国天主教传教士在贵州的经济掠夺·····	吉 人 (193)
基督教贵阳圣公会和云贵教区的“应变”活动·····	杜光炎 (203)
考辨·订正	
有关贵州几件史实的考辨·····	何静梧 (214)
对《回忆国民党一〇一军起义》一文的更正·····	程奎朗 (216)

近七十年来贵州的医药卫生事业

钱 允 中

我在贵州医务界工作了几十年，回顾贵州省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感到虽然基础很薄，但医务界的人士，兢兢业业地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解放以来，我省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很快，今后发展的远景也很好。我这篇文稿，便是就我所知的情况，作一回顾。由于事隔多年，手边资料缺乏，有些记忆模糊，一定还有遗漏，请医务界的同志予以补充和更正。

一、医疗卫生机构的演变

过去多少年来，在贵州广大农村中主要是巫师治医，但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认识到许多中草药可以防治疾病，逐渐掌握了一些医术。如用草药治疗毒蛇咬伤，用毒药箭杀死野兽等等。因而，民间流传有“家有半边莲，可伴毒蛇眠”的谚语。据调查，我省现已查明的中草药有二千余种，内有许多已应用于临床。如用中草药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和某种癌症，已取得可喜成果，颇引起世界医学界的兴趣和重视。

自古以来，贵州没有设置医疗卫生行政机构。清末民初，在省会贵阳，除陈乾生先生用西医术为人治病外，全靠中医师为人

防治疾病。当时名中医有袁训皆（人称袁九公，系袁家玘的祖父）、张龙门（已故中医研究所名中医张叔骏之父）、宋小儿（佚其名，因精于儿科，人称此名）及陈半夜（因多于半夜为人看病，故称）。到民国初年，张龙门先生教授的十名中医师在贵阳是很有声誉的，他们是：陈祝尧、王希仲、肖朗轩、汪藕航、吴石孚、何涟波、陈炳轩、梁希伯、唐希泽、吴叔奇。俟后，中医师开业行医者日益增多，如名医王聘贤、石玉书、程云深、袁家玘等。抗日战争时期，外省来黔行医者，更为众多。

一九三七年初，贵州省国医馆在贵阳双槐树成立，由王激莹（当时省政府财政厅长）兼任馆长，并于三月间设一国医研究训练班，共有学员四十余名。又于是年春设一国医研究所。

一九三八年四月，贵州省卫生委员会乃正式成立，管理全省卫生行政事务。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孙希文、周贻春、何辑五、李宗恩、杨崇瑞、姚克方、朱章虞。常务委员是何辑五、朱章虞、周贻春，并由何辑五任常务主任委员。

这个委员会之下还有一个健康教育委员会，于一九三八年九月成立，主任委员是朱章虞医师，常务委员有戴天佑等。委员中有严镜清教授（贵阳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授）及范日新教授等。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日寇飞机轰炸贵阳，死伤几千人，学校皆疏散至乡间，这个委员会也就不复存在。

另一个委员会是省自救会，系训练学生战时救护的组织，也因学校疏散而无形解散。该组织是一九三八年十月成立的，其成员除国民党省政府官员外，另有朱懋根、范日新、伍宗裕、乐景武、高选民等医师参加。

贵州省卫生委员会于一九四〇年四月召开第一次卫生行政会议，决定下分六个组，各组成员如下：

1.行政组：戴天佑、范日新、韩恕、张崇德、李方邕、魏建宏、赵光钺、李德溥。

2.卫生教育组：戴天佑、金理财、蒋会泽、沈元晖、潘瑾。

3.防疫统计组：俞焕文、甘怀杰、郭景行、盖宝璜、李志忠、杨希荣、乔树民、张人俊。

4.戒烟组：王纪民、蔡谦、汪德晋、管毓鲁、汪庚秋、郑致。

5.环境卫生组：杨铭鼎、吴抗勉、崔俊升、许德约、陆祖仁。

6.妇幼卫生组：李瑞林、陈本真、杨励杰、管葆贞、李方邕、沈育民、陆祖仁。

在这个卫生行政会议上，张崇德作了《贵阳卫生事务所工作报告》。一九三八年四月成立贵阳卫生事务所（相当于现在的市卫生局），范日新任第一任所长，一九三九年改由张崇德任所长。另一个报告是《卫生试验所工作报告》。卫生实验所成立于一九三九年五月，系与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卫生署卫生实验处合作而成。当时卫生实验处有寄生虫学系、防疫检验系、化学药物系及环境卫生系。处长是姚克方医师。该所只有技佐二人，练习生一人，他们分别到实验处工作。

还有《健康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杨济时教授《医院管理问题》的讲演。

此外，还有一个报告是《定番县（今惠水）卫生院工作报告》。这个县的卫生院隶属于乡政学院卫生组。乡政学院系当时“国联”的一个机构，原设于河北省定县，因芦沟桥事变，日寇入侵我国，该院全体南迁至我省惠水县。该院分三个组，即经济组、农业组和卫生组。各组都招收研究生。卫生组组长初为杨崇

瑞医师，不久由余焕文医师接任。医师有谷蕴玉、刘锡霖、米国立等。卫生组还有三名研究生，他们是安作楫、陈宗贤、李克温。后因研究生常唱革命歌曲，该院当局表示厌烦，同时研究生对当局给他们的待遇不满，一年后都先后离开该院。如安作楫教授（现任贵阳医学院眼科教研室主任兼附院副院长）就是这样。当时贵阳医学院公共卫生学基地也设在该院卫生组。乡政学院于抗日战争后期由陈志潜医师负责，随即迁往四川乐山县。

一九四〇年，朱章赓医师辞卫生委员会常委职，由姚寻源医师接任，后者也于一九四一年去新疆工作。

贵州省卫生委员会成立后，先后在六十七个县设立卫生院、所。当时这些卫生院所，不但人员缺乏，而且根本谈不上医疗设备。每一院、所，每月只由省政府拨给经费四十元，不足之数由地方解决。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省内还设有国民党卫生署直接领导的公路卫生站三处，桐梓、马场坪、毕节公路卫生站。这三个单位专为公路上来往车辆上的工作人员及旅客服务，每个卫生站的人员较多，器材设备也比各县卫生院所好得多。如马场坪公路卫生站有主任一人，医师二人，助产士一人，公卫护士三人，护士二人，助理员六人，秘书一人，事务员一人，会计兼出纳一人。当时站主任姓王，杨洁泉（现为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于一九四〇年曾在该站任过外科医师。毕节公路卫生站主任曾由许德约（现市传染病院院长）担任过。

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册亨县成立一个防疫站，站长是卢超。此外，还有一个防疫队，他们曾于一九四〇年先后在普定、罗甸、惠水、清镇、安龙、册亨、贞丰等十四个县进行调查，共检查十二岁以下儿童五千八百七十八人，脾大指数平均为百分之十五点

二，贞丰县最高，达百分之七十三，还发现中华疟蚊五种。以后，此队分为两个队，并延请专家组设一防疟委员会。

一九四一年省政府设卫生处，姚克方医师任处长，省卫生委员会的工作乃告结束。

一九三八年贵州省卫生委员会成立前，在省会贵阳只在警察局内有一清道伙队，负责街道清扫。抗日战争的第二年，全国大部土地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许多医学专家和卫生医务人员，或受聘来贵阳工作，或逃难来贵阳，一时贵阳山城也颇热闹，但贵州的医疗卫生事业还是没有什么起色。各县虽摆一个县卫生院、所统管全县卫生工作，但一无人，二无设备，三无经费，在省会贵阳，也是机构有了，官也有了，可是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呢？兹举二例，可见一斑：

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日寇十八架飞机在贵阳丢下无数的炸弹和燃烧弹。当时贵阳建筑多是木材结构，又无防空设备，以致日寇飞机得以低飞狂轰滥炸，造成大十字周围一片火海。不说消防无力，就是外伤急救，也只是依靠刚成立不久的贵阳医学院师生们临时自动组织的小组和省立医院赶到现场参加抢救。但因缺乏急救器材设备，参加抢救的师生们虽累得满身大汗，也只有瞪眼看着受伤而死的人民，不禁泪珠滚滚！估计“二·四轰炸”（贵阳人民这样称呼那次惨剧）死伤四、五千人，而国民党的宣传却硬说“很少伤亡”。

另一惨剧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间。当时贵阳尚无自来水厂，居民皆挑取严重污染的南明河水和市内外少数几口井的水食用。是年六月初，即零星发生霍乱病例。当然，这个烈性传染病首先袭击对象是劳苦大众，所以并未引起省当局的重视，也就没有采取什么预防措施，官方纪录只说：“省会霍乱病人达四十八

例之多”。次年夏，霍乱开始大流行，这时，他们当官的也害怕惹到自己身上，慌了手脚，让当时的省立医院院长陈崇寿教授（当时贵阳医学院兼任教授）组织贵阳医学院的高班学生参加抢救。可是，那时连生理盐水都没有，只好将开水内加上氯化钠，煮过后，过滤一下，就给病人皮下注射。可以想象，这种办法能救活几人？我们只是怀着悲痛的心情，看着那些病人随着企求的目光死去！而当时的某些开业医生，则以十块银元五百毫升“进口”的生理盐水，给那些无病而又怕得病的富豪官僚“治疗”。估计当年因霍乱而丧生的穷苦人民在千人以上。幸而卫生署拨给少量霍乱疫苗为人接种，虽然接种一些人，但为数甚少。一九四〇年又发生流行此病，死了不少人，到一九四一年，还有不少病人。

一九四三年，姚克方去重庆，卫生处长由姚寻源医师接任。年余，姚去新疆，施征信教授（当时贵阳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授）接任，一九四六年改由贾志钦接任卫生处长。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贵阳解放了，随之各县也逐步解放。军管会、民政部、卫生处当即派了许多医疗队，随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为群众防病治病，对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起了积极作用。

一九五〇年省卫生处成立，张超伦医师（苗族）任处长，潘阳泰、邹筱孟二同志任副处长。重建各科室，并在各县设卫生科，统管全县卫生工作，并整顿各县县医院。

一九五〇年全省八个行署，七十九个县，人口一千三百万，少数民族占三分之一。据统计一九四九年六月以前，只有四十六县有卫生机构，天花病例不断发生，患者达四千八百二十二人，死亡四百人；痢疾、疟疾常年不断；回归热在黔西各县普遍流行，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如一九五〇年八月，贵筑县青岩区燕楼乡一带（现属贵阳市花溪区）二百七十八户，

九百二十二，患回归热者达二百八十五人，死亡九十二人。此外，还有斑疹伤寒流行。于是卫生处积极组织防疫队，深入农村防止疾病流行，特别是防止霍乱的发生，收到良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卫生处加强了对接管的贵医附院和省立医院的领导，并于一九五〇年新建一所卫校附院，即干部医院前身，现为省人民医院。经过三十余年的积极筹划和推动，现全省各地区（专州）都设有卫生局、地区医院、卫校、防疫机构等。各县也设有卫生局、县医院和防疫站等。此外，省卫生厅还有省防疫站、省人民医院、省中医研究所、省肿瘤防治研究所、省心血管病研究所、省精神病院、省职业病院、省卫生干校、省药检所、省麻风病院、省中心血站等直属单位。还逐年积极为各级医疗防疫机构增添人员及设备。如解放前从未见过的心电图机，现在不但在大医院有此设备，即便在区医院也有此等设备。现在许多外科手术不出县、不出区、不出厂，方便了工农群众，促进了生产。

一九五〇年邹筱孟同志病，潘阳泰同志一九五一年去重庆，一九五二年赵朋意同志来主持卫生厅工作。一九五四年，江平鲁、陶立功二同志又来协助领导全省卫生工作。一九六〇年，王振江、马正坤又代替江、陶二同志到卫生厅领导全省卫生工作。在此期间，负责卫生工作的领导同志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面向工农兵，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使贵州医疗卫生事业越办越好。

解放后，在党的团结中西医方针指导下，中医师的社会、政治地位大大提高。各级医院吸收有真才实学的中医师参加医院的治疗工作；贵阳医学院于一九五八年成立了中医系，培养了不少优秀的中医人材，现在有不少的人已是各医院的骨干力量。该系

于一九六五年从贵阳医学院分出来，以马正坤同志为党委书记，成立了一个独立的中医学院——贵阳中医学院，现由袁家玘教授任院长。该院近年来在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和肾炎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一九七九年开始，省卫生厅委托贵医中医科和贵阳中医学院办培训西医学习中医班，有二十八人，都是各院抽调的有多年临床经验的主治医师。还有一个中医进修班，有二十六人，在名中医的教导下，学习三年，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毕业，大部学员成绩优良。

一九五六年，在省卫生厅领导下，成立中医研究所，吸收不少名中医在所内进行中医文献研究、整理及带徒应诊工作。由名中医、卫生厅副厅长王聘贤兼任所长，伍大觉任副所长（二同志都已逝世）。“文革”后，该所在卫生厅直接领导下加强了领导，由罗克聪主任医师任所长，建立健全各科室，全所积极努力，在中草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解放后三十年来我省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都是成倍地增加，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传染病的防治

贵州解放前，除了在四十年代有册亨、紫云、望谟、罗甸四个防疫站外，向无其他防疫机构，所以各种传染病常年不断地出现和流行，危害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即使是在省会贵阳也是霍乱、天花、斑疹伤寒、伤寒、痢疾终年不断。

一九四一年，贵阳成立市政府，卫生事务所改为市卫生局，设于陕西路。历任局长为张崇德、何思惠、王贵璠、陈家琪、沈守成、戴必正。这些局长大多是医师，有的对卫生防疫工作是有

经验的。但在当时，由于经费不足，防疫设备缺乏，各类疫苗供应又不及时，以致各种传染病不能有效地控制。

解放后，一九五〇年省卫生处（卫生厅前身）组织了许多医疗队随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为群众防病治病，发挥了积极作用，已如上述。一九五〇年底，美帝侵入朝鲜，我省即于一九五一年十月派出骨科医疗队奔赴朝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防治伤病，一九五二年五月回国。队长是杨清泉，副队长是孙其发，队员有冯天骏、王裕、许再琼、张星桥、王敬三、朱四维、鲍镇美、杨再英、李立邦等同志。一九五三年四月又派出一个内科医疗队，领队是杨荣勋，队员有王明海、邹彩华、姚仁里、祝庆平、刘宏芬、谢墨香、王本立、蒋珍等同志。这些医护专家在朝鲜作了大量的救死扶伤的工作，还担负了部分教学工作。与此同时，还在一九五一年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抗美援朝医疗队去四川，成立了西南志愿军疗养院第二分院，为前方治疗医院转来的伤残者服务。他们一直工作到一九五三年三月，大部分回贵阳，一部留四川。他们的辛勤劳动，很得荣军同志们的好评。这个医疗院的领导是刘英、董银荣、安仲华、王存方等同志；医护人员有罗克聪、梁浩、郭学康、张艾芹、欧阳莖、张有珍、张家齐、马恒余、杨志卿、赖相禹、舒力行、罗林松、王中喜、朱桂芳、陈瑾等同志。

一九五〇年，贵阳市卫生局由秦克夫同志任局长，整顿科室，建市立医院（即今市妇幼保健院前身），又积极抓卫生防疫工作。年余后，贾波同志担任局长。一九五二年冬，贵阳市白喉流行，来势很猛，当即由贾波同志领导、组织专家教授多人（如安作楫、郭垚、何明达、彭清超、苏德隆、徐玉凯等医师）在市西小学设一门诊部，日夜为病儿及少数成人治疗，还借用六冲关天主

堂房屋设临时病院，收治患者。由于预防措施及时，治疗得当，月余时间，即将这一严重的呼吸道传染病控制下去，很得群众好评。又对全市饮用水实行消毒，肠道传染病也逐渐下降。更积极推行各种常见传染病疫苗预防接种，烈性传染病霍乱再也未发生过。

一九五二年，省防疫站成立。由秦克夫同志任站长，建立了各科室，不少专家在站内担任技术指导和实际工作，做出不少成绩（如细菌学家赵丕文，公共卫生专家周戎敏、王贵璠、邓振义等医师），还有一个防疫队，有五百余人。防疫队的同志们经常下农村为农民群众防治疾病。一九五一年全省基本上消灭了天花的发生。一九五六年全省各县都成立了县防疫站，同年将危害人民的回归热消灭。

一九五五年全省估计约有三百万疟疾病例，致使部分农作物不能及时收获。省防疫站当即在炉山（今凯里）设一防疟站，重点研究抗疟工作。次年由秦克夫站长组织领导一防疟调查团，在天柱、锦屏二县的瓮处、茅坪两个地区各村寨进行灭蚊及居民血片疟原虫调查。这个调查团由许多专家教授和大批青年医务工作者组成。如孟庆华、金大雄、杨锡寿、李鸣皋、彭清超、李杰新等。青年们大多是刚从卫校毕业的医士和由部队转业的医务工作者。由周中丞、任光国二同志率领，活跃于清水江两岸，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对当年该地区的秋收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些当时的青年，现在大部分已成为各级防疫机构的骨干力量。以后各县普遍开展服药防疟工作，至目前，全省疟疾发病率为十万分之一，基本上消灭了危害贵州各族人民健康的疟疾。

另一寄生虫病——丝虫病，在铜仁地区流行，德江、沿河二县发病率竟高达百分之三十二至三十七，此病多使青壮年丧失劳

动力。由一九七〇年开始群防群治，目前该区已基本消灭丝虫病。

此外，在麻风病的治疗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省在三十年代有加拿大医师二人，在毕节县撒拉溪一麻风病院为患者治病，当时因方法不多，疗效不显著，只起到隔离的作用。解放后，我政府对此病十分重视，设有皮防所，并有麻风病院二所，麻风村六十二个。撒拉溪麻风病院于解放后，在人力物力大大充实下，已治愈麻风病人六百六十八人。

三、药学事业发展概述

抗日战争以前，贵州药学工作人员极少。据一九三六年调查，只有药师二人，药剂员五人，西药房四个，中药铺一二十家，又都集中在贵阳。抗战军兴，国民党军医学校、湘雅医学院内迁贵州，卫生署中央医院分出部分人员来贵阳成立贵阳分院，国民党军医署的若干卫生材料库也内迁我省。此外，在大量入黔群众中，也有一些药学工作人员。于是贵州就成了药学人员较为集中的省分之一。特别是军医学校药科，是我国较早的极少数高等药学教育单位之一，有不少老一代的药学家在该校任教（如林公际等）。当时的毕业生有一些目前仍在贵州工作。该校在四十年代初成立了药品制造研究所，所长是张鹏冲。有些教师还开办了毕胜玻璃仪器厂，解决了当时玻璃仪器的困难。然而，由于军阀、国民党政府不重视医药事业，特别是药学事业，在一九四三年左右，尽管在全国已办了二十多年的高等药学教育，但国民党卫生署发出的药师证书不过四百来号。所以在贵州的药师实际上并不很多。这期间在贵阳还成立了中国药学会贵阳分会，但并没有开展什么学术活动。

在抗战期间，我省所用西药主要依靠进口和省外供应。但一些简单制剂，需要数量较大，价格较低，不能单靠省外输入，于是先后办起了一些药厂。但当时设备匮乏，资金有限，技术力量薄弱，多数所谓药厂，不过是个体家庭生产，压制一点苏打片等片剂，制些注射用水、生理盐水等针剂及输液、酏剂、糖浆剂等。其中略具药厂规模的有以下四家：

（一）军医学校药品制造研究所，主要生产硝酸银、乳酸钙、活性炭等少数原料以及葡萄糖、氯化钙等针剂和若干种片剂等；

（二）新洲制药厂，生产酒精、口服和注射用葡萄糖粉及一些针剂；

（三）一元化工厂，产品以氧化锌为主，还生产硫酸镁、咖啡因等少数原料药；

（四）德昌祥制药厂，生产中药丸药等。

在各医院药房，主要只是配方发药，药工人员很少。输液等必不可少的药房制剂只有少数两三个医院能配制一些。中央医学院贵阳分院当时拥有一些较有名望的医师，威信较高，但药房只有四个工作人员。限于缺乏购药资金和人员不足，甚至特约私商承办该院的门诊部药房约两年之久。

总之，尽管当时能负担西医西药诊治费用的只是少数居民，但药品仍不能满足需要，一遇疾病流行，便束手无策。如一九三七年贵阳霍乱流行时，由于没有输液，只得用开水溶解氯化钠给病人皮下注射。

抗战胜利后，军医学校迁沪，新洲药厂停办，湘雅医学院、中央医院分院等先后迁回原地，我省留下的药师更屈指可数了。药厂中只有一元化工厂仍继续办下去，但主要产品氧化锌是作为

工业原料而不是药品生产，因此还能维持一定的销售量。

在此期间，虽然交通逐渐恢复，便于进口和外省药品运入，供应有所改善，但由于货币急剧贬值，人民生活日益困苦，进口的药品价格高昂，如链霉素在贵阳初上市时，每瓶几与一两黄金同价，普通老百姓对西医西药只能望洋兴叹而已。

这时省内药剂人员的培养，只有高级医事职业学校（中专）设有药剂科，但毕业人数很少。此外，新药商业同业公会办过一期药学讲习班，目的也只是为了解决该业需要的药剂人员。

一九三八年五月，国民党省政府建一省立医药制造厂，资金二万元，设于次南门外回龙寺内，初任厂长是戴尚文，后由姚克方教授任厂长，产品仅限敷料、酏剂、流膏剂、酊剂及纯盐提炼等。一九四五年由高述之药师任厂长，迁至水口寺。一九三九年在石洞坡建一牛痘苗制造厂，由陈文贵医师（卫生实验处防疫检验系主任）负责监制牛痘苗。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贵阳霍乱流行，幸得该所制出霍乱疫苗若干瓶，得以为群众接种。

贵州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解决人民防病治病的需要，运进了大量药品，并在贵阳迅速组织了省人民制药厂，短期内就成立了原料、敷料、片剂、针剂等车间，投入生产。产品为咖啡因、硫酸镁、硬脂酸、药棉、纱布、多种针片剂，对解决药品敷料的需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许金池药师等人利用本省原料制成的高锰酸钾，为国内填补了空白。以后为了扩大高锰酸钾生产，该厂迁往遵义，改为高锰酸钾厂，不但供应国内需要，而且还有部分产品出口。一九五六年在贵阳成立了公私合营贵阳制药厂，迅速建立厂房，药品产量日益增多。目前已发展成为我省最大的制药厂，职工千人左右，大量生产口服和注射用葡萄糖，各种输液和针片剂，在国内也有一定地位。该厂生产的黄连